

148

鲁方根 郭洁敏 陈金桂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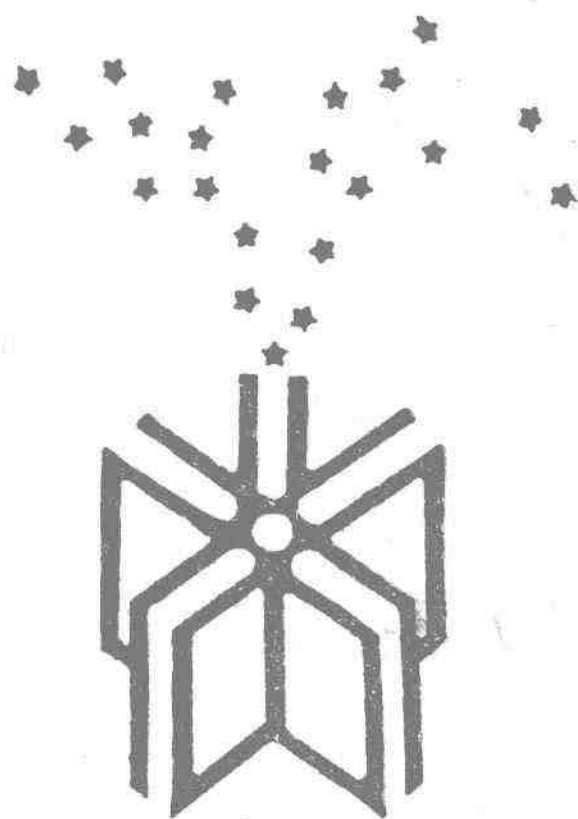
名人最后的心声

WU JIAO



五角丛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名人最后的心声

鲁方根 郭洁敏 陈金桂 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4 号

责任编辑：王牧群

封面设计：陆震伟

225 / 702

名人最后的心声

鲁方根 郭洁敏 陈金桂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75 字数 132,000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200 册

ISBN 7-80511-797-7/I·188

定价：5.50 元

序

邓伟志

人在一生中要讲许许多多话,即使是聋哑人也会用手语道出许多话来。

可是,人生在世,用政治家的话来说,一言一行,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人总是代表一个社会角色在讲话;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人摆脱不了心理卫生的环境;再讲得俗一点,对芸芸众生来讲,还有各种各样的“欲”。这些欲,既会“障眼”,也会“障言”。因此,能处处做到“言为心声”的人不能说绝对没有,可惜实属不多。只有为人杰者,能做得比较好一点。所谓“好一点”也是“比较”而言。毛泽东堪称中国一杰,天下大杰,他曾豪迈地说,他是从不讲违心话的。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品格。然而,就在他声称从不讲违心话的时候,他又说:我这是第一次讲违心的话。可见,连伟人、巨人也难免有那么一次违心,也许还不止违心一次呐!

上面是从社会横断面上讲的,如果从人生的纵向来看,似乎也可以分阶段,从幼到老,从生到死,“言”与“心”的分离度并不一样。幼儿的分离度小,不讲假话,讲真话。道理是:讲假话也是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列宁在谈论意识起源时,说狐狸狡猾就狡猾在会做假。不过,天真的幼儿虽不讲假话,但也讲不出高明的话。幼稚是同幼儿相联系的。成年人能讲高明的话,可惜有些成年人太老成,甚至是老成持重得言不尽意,言不由衷,即“言”与“心”的分离度太

大。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一旦老到快要老死的时候，或者是不老而又快死的时候，“言”与“心”的分离度又会由大变小。《论语·泰伯》里曾肯定过曾子的警句：“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哉，曾子之言。妙哉，孔子之曰。我眼下还没有“将死”的体会，但是我接触过不少将死的人。不是么，前一阵子兴起了青年人爱听离休老领导讲话的“热”。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们既讲了在位几十年的经验，又道出了在位时不能讲的真谛吗？从逻辑上也能推论出。常言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着的时候，难以抛却身外之物。将死时，何必还要为身外之物所累？何必还要为身外之物所羁？自己的历史就要结束了，总要尽量跳开出历史的局限吧！历史大背景不易跳出，历史小背景还是容易跳开的。脑子指挥舌头就是了！杰出的人超越自己，超越历史，超越得多一点；不太杰出的人超越得少一点；庸人不能超越。分水岭就在这里，岂有他哉！

如今摆在我面前的《名人最后的心声》书稿清样，收入了国外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理论家、艺术家们的最后的心声。他们的横坐标是名人，纵坐标是“最后”，即“将死”，二者的交点，就决定了这本书的价值。

“最后的心声”是他们一生的结晶，一生的升华，一生的归宿。不论他们是延长了自己以往的思想，还是背叛了自己以往的观点，也不论他们的阶级性有多大差异，都是归宿，都是耐人寻味的，寻出人生之味，寻出人格之味。

1995.5.9 于上海社科院大礼堂

目 录

序..... 邓伟志

恩格斯

在宁静的海底长眠 1

列宁

革命导师的最后岁月 5

林肯

殉难的总统是位英雄..... 10

甘地

无悔的殉难..... 14

拿破仑

折翅圣赫勒拿岛的雄鹰..... 19

恺撒

· 突如其来的惨剧..... 28

戴高乐

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 32

巴顿

惨遭车祸的一代名将..... 35

玻利瓦尔

“解放者”为拉美的团结大业死而后已..... 40

杰斐逊

如愿以偿的《独立宣言》起草者	47
希特勒	
地下室中暴君的末日	52
牛顿	
站在巨人肩上向后人告别	56
爱因斯坦	
为真理和正义服务的科学巨人	60
居里夫人	
他们的名字是用生命写成的	65
爱迪生	
发明大王死而无憾	69
巴甫洛夫	
不要辜负祖国的希望	73
阿基米德	
血染几何图	76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之父”在病痛折磨中谢世	80
诺贝尔	
为人类造福的诺贝尔奖	85
哈维	
科学之舟在政治风浪中沉没	90
巴斯德	
“人类的造福者”临终时一无所求	94
苏格拉底	
一代哲人为信仰视死如归	98

黑格尔	
霍乱夺走了时代的儿子	102
莎士比亚	
属于所有世纪的戏剧家	106
泰戈尔	
在缪斯的怀抱中永别	115
托尔斯泰	
艰难的遗嘱	120
契诃夫	
带着香槟酒酒香长眠	125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今天就要死去”	129
吉卜林	
长眠于破碎的帝国梦	133
雨果	
凯旋门下的葬礼	137
莫泊桑	
短篇小说使他获得永生	148
贝多芬	
用痛苦为人类创造欢乐	157
凡·高	
画魂与向日葵的光辉千古长存	164
哥伦布	
永恒的远航	171

恩格斯 在宁静的海底长眠

恩格斯(1820—1895)在过了74岁生日以后,还感到自己“精神饱满”,完全能够工作。但是,他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我的状况是:74岁了。我现在已开始感觉到这一点,而工作是多得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如果我能把自己分成一个40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34岁的弗·恩格斯……,那就好办了。”

1894年,当他的女管家路易莎·考茨基同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医生结婚时,恩格斯向他弟弟海尔曼·恩格斯表示,“不愿意在晚年把自己交给陌生人来管”。因此,他同弗赖贝格尔夫妇一起搬到离城不远的一所比较大的三层楼房子。他把自己的工作室和寝室安排在二楼,弗赖贝格尔一家住三楼。这样,路易莎·弗赖贝格尔还能继续照顾他的生活。

同年12月,他在写给维克多·阿德勒医生的信中轻松乐观地说:“我吃东西有分寸,对待我的消化器官,就像对待一个好噜哝的官僚主义的长官一样,什么都听他的指挥;并且为了防止咳嗽、支气管炎等发作,老是穿得很多,屋子也弄得很暖和。总之,在各方面都完全按照一个年老多病的人那样行事。”在致左尔格的信中,他郑重其事地写道:“告诉你一句体己话,75岁的我,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健壮了。”

恩格斯虽想多活几年来完成许多工作,但是他并不怕死。1895年初,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看一看新世纪。”随后又说:“到了1901年1月1日,我已完

全做不了什么，那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

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1895年3月，他常在春天发作的旧病又患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最近四五年来，每到这个季节，这种病就把我弄得卧床几个星期。”不久，在他颈部右侧出现了一个肿块。这个“讨厌的肿块很痛，于是引起了失眠”，这样恩格斯就“几乎完全不能工作了”。给他治病的医生知道，这是食道癌，正在迅速扩散。可是，恩格斯本人并没有想到患的是癌症。他忍受着剧烈的病痛，仍然毫不懈怠地关注着政治事件和革命工作。在1895年上半年，他写了至少有75封信。这些信中，除了一些私事以外，讲的都是英国、法兰西、德国、奥地利、俄国、西班牙和美国的工人运动以及哲学和经济学问题。

他虽然一直在以惊人毅力坚持工作，但已经为自己一旦死亡作好了一切安排。起先，他指定马克思为他的遗产的唯一继承人。马克思逝世后，他又重新写了一份遗嘱，把遗产继承人改为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以及马克思已故大女儿燕妮·龙格的孩子们，还有海伦·德穆特。恩格斯在逝世前两年，写了最后一份遗嘱，签署的日期是1893年7月29日。后来于1895年7月26日，他又在这上面加了一个附注。按照这份遗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两人应各得其遗产的八分之三；她们每人所得份额的三分之一属于燕妮·龙格的孩子们，因为孩子们年纪尚小，由她们两人负保管责任。这样，他就给亡友的孩子和外孙们，保证了以后足够的生活费用。遗产中剩下的八分之二连同家具，都赠予长期照顾他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此外，他还要付一笔款子给他的内侄女玛丽·艾伦·罗舍，并且指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得一千英镑。恩格斯于1894年11月4日写信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说：“请首先考虑你们得到这笔钱的事，然后再考虑别让它落到普鲁士人手里去。当你们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定时，请喝一瓶好酒来纪

念我。”恩格斯把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所有信件都交给了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把自己浩瀚的藏书移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指定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

7月23日,恩格斯还在伊斯特勃恩休养时,满怀希望地写信给劳拉·拉法格:“看来我的颈部到了紧要关头,脓肿处可以切开,以后我终于可以轻松一些了!希望这个漫长的过程有个转折点。由于胃口不好等原因,我已经相当衰弱。也应该是好转的时候了。”可是,在信的末尾,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我没有气力写长信,再见吧。”这是恩格斯亲笔写的最后一封信。

7月24日,他在维克多·阿德勒的陪同下,从伊斯特勃恩回到了伦敦自己家里。他一直到最后,还指望能战胜病魔。

阿德勒是从监狱请假出来探望他这病危的老师 and 朋友的,8月3日必须离开伦敦。在赴维也纳的途中,阿德勒遇见了倍倍尔,就把恩格斯的病情告诉了他。两天以后,倍倍尔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当阿德勒到达伦敦时,恩格斯还能够说话,可是讲了半个钟头,就讲不出来了。他只能利用一块小型记事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虽然如此,他的情绪很好,怀着痊愈的希望……他还在那记事板上写着一些开玩笑的话,但是别人看了是很难受的。能够做到这样,这是他真正的幸福。他只能吃流质,体力已经非常衰竭了。在阿德勒临行前不久,他还能自己料理身边琐事,后来这也不行了,连穿衣脱衣都得别人帮忙……这种状况还能维持一个星期,不过哪一天都可能出事。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8月5日,恩格斯已经不省人事地躺了两天。到22点30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国际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和思想家。

恩格斯的追悼会于1895年8月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

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遵照恩格斯的嘱咐,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学生和同志们大约 80 人参加了追悼会。在灵前讲话的,除了恩格斯的一个侄子和赛米尔·穆尔以外,还有代表德国工人运动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受奥地利工人运动委托的奥古斯特·倍倍尔、代表法国工人运动的保尔·拉法格以及比利时工人党的代表爱德华·安塞尔、荷兰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范·德尔·格斯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爱德华·艾威林。讲话完毕,就宣读来自俄国、匈牙利、丹麦、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唁电。

悼念仪式结束,一辆专车把盖满了花圈和鲜花的灵柩运到了沃金火葬场。恩格斯在生前曾要求将他的骨灰沉到海里去。于是,在一个海涛澎湃的秋日,即 1895 年 8 月 27 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在伊斯特勃恩海边,离海岸大约 5 哩远的地方,执行了他的这项遗嘱。

(鲁方根)

列宁 革命导师的最后岁月

1924年1月21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列宁(1870—1924)与世长辞。当日深夜,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全体会议;次日,发表了《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指出列宁的事业是不朽的。他的逝世,决不是他所开创的事业的结束。“列宁永远活在我们每个党员的心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获得最后的胜利”。

23日,列宁的遗体从戈尔克运回莫斯科,安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内。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青年,冒着零下30℃的严寒,排着长队,向列宁告别。严肃的静默不时为难以抑制的痛哭声所打破。有的人几乎痛不欲生,滚在地上哀嚎。在4天的时间里,有90多万人瞻仰了列宁的遗容。

长期的紧张工作、艰苦的国外侨居生活和敌人暗害时所留下的创伤,严重损害了列宁的健康,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1918年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国内外敌人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起了进攻。列宁以全部精力投入捍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就在这关键时刻,疾病开始向他袭来。他经常面色苍白,疲惫不堪,步履蹒跚。列宁夫人娜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说:1918年夏天,列宁什么也没有写,夜里无法入睡。“我保留他8月份拍的一张照片。他好像病得很厉害。”医生诊断他患有高血压。8月30日,列宁到米赫里逊工厂发表演说,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卡普兰乘机向他

行刺。列宁身上两处受重伤，生命处于危险中。俄国人民极其担忧地关心着列宁的病况。许多人愿献出自己的血输给列宁，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匀出一份送给列宁。在与死神两个星期的搏斗中，列宁战胜了病魔。他身体稍有好转，就要求工作，但医生要他“完全忘记工作”。列宁回答：“现在还不是时候。”伤愈后一周，他就对军事问题发出了指示电报。

高血压不时折磨着列宁。他经常感到疲倦。列宁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患病是1920年12月30日，在第八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原定日程，列宁作闭幕发言，但他竟难以坚持，要求首先发言。他对与会者说：“很不幸，但我非常痛苦，我不能不这样做。”两天后，他到下诺夫戈罗德（后改名高尔基城）去休养。一个月后，列宁回到莫斯科，又全力投入巩固新政权的斗争。但大脑疲劳和失眠仍不断向他袭来，思维常常失去控制，列宁不得不再次离职休养。1921年12月6日，他写信给高尔基说：“我非常疲倦，失眠。现在去就医。”15日，他写信给党中央书记莫洛托夫：“请按医嘱延长我15天休假。”

列宁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与不断发作的脑动脉硬化斗争中度过的。1922年5月，列宁大脑疾病第一次剧烈发作。他感到头痛甚剧，失眠，呕吐，腹部疼痛，右侧身体活动不便，时而丧失语言能力。诊断结论是：大脑左半球血栓堵塞。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列宁恢复了健康；10月初，返回莫斯科，又开始忘我地工作。据列宁的书记载，在两个半月里，列宁共“写了224个公文信件和便条，接见了171个人（125次），主持了32次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政治局和各种委员会的会议”。极度紧张的工作，使列宁又一次病倒。12月15日，列宁大脑疾病第二次发作，他被固定在床上或轮椅里，被禁止从事任何工作，不准看报，不准会见客人。他自知来日无多，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他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恢复说话

功能以后,决定口授一些信件和文章,以防不测。著名的列宁《遗嘱》,即1922年12月23—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的补充》,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根据列宁生前指示,这些文件必须待他逝世以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布。

1924年5月18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克鲁普斯卡娅将列宁的《遗嘱》交给中央全会。5月21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召开特别会议,由加米涅夫宣读列宁的《遗嘱》。在《遗嘱》中,列宁对4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2位年轻的中央委员(布哈林和皮达可夫)作了评价。

列宁认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他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让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在谈到托洛茨基时,列宁说他同斯大林是“中央两位卓越领袖”;认为托洛茨基“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同时,列宁还谈到了托洛茨基以前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指出可以少把这个错误归罪于他个人。

《遗嘱》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防止党的分裂(主要是防止党的最高领导层之间的分裂),增强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列宁指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代表大会讨论了列宁的信,考虑到斯大林的功绩以及他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党集团所进行的

不调和斗争，同意斯大林继续留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但责成他考虑列宁对他的批评，并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

1923年3月10日，列宁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发病。他不能说话，右侧半身完全麻痹。14日，政府发布公报说，列宁的健康情况恶化。但列宁仍以顽强的意志同疾病斗争，努力恢复说话、阅读和写作能力，学习用左手写字。医生说他是“绝无仅有的病人”。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他（指列宁——引者）的脑子始终都在紧张地工作。我记得，当最后一次致命的疾病向他侵袭的时候，医生给他规定了严格的制度，嘱咐他午饭后卧床2小时。伊里奇以前是遵守制度的，但是他对于医生的要求抱怀疑的态度。他有一次这样说：‘他们无法叫我不想问题。’的确，不论是躺在床上、散步或谈论简单的日常生活上的问题，他总是不倦地思考着他毕生所从事的事业，他为这一事业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力量，自己一生的每一分钟。”

7月，列宁的病情逐渐好转，他睡眠安稳，食欲渐增，每天听秘书给他读电报、报刊的社论和文章，还经常坐着轮椅在公园里散步，与游人交谈。与此同时，党和人民十分关心列宁的病情。无数信件和电报不断寄到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寄到各个报刊，有的直接寄到列宁的住所，问候列宁，祝他“健康长寿，继续为工人阶级工作”；祝他“早日完全恢复健康，回到苏维埃共和国舵手的岗位上来”。

从10月中旬起，列宁的病情又趋恶化，他经常昏迷，最长一次昏迷了三四个星期。1924年1月20日，列宁第四次发病，病情急剧恶化，次日凌晨，他失去知觉，手脚不断抽搐，并伴有心颤和气喘，呼吸频率每分钟36次，心速每分钟120~130次，体温高达42.3℃；后来，身体抽搐加剧，体温超过体温计刻度，无法测量。21日18时50分，列宁与世长辞。诊断结论是：列宁的主要病状是过度的脑力劳动所引起的严重的动脉硬化，引起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脑溢血。克鲁普

斯卡娅在谈到列宁生前最后几个星期的情况时写道：“他一直到临终前仍然同过去一样，是一个有巨大意志和自制力的人，在逝世的前夕还在笑，说着笑话，亲切地关怀别人。”

为悼念列宁，1月26日，全俄苏维埃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永远纪念列宁的决议和告劳动人民书。27日下午4时，安放列宁遗体的灵柩由工会大厦移入红场上专门修建的陵墓里，哀乐、工厂的汽笛和礼炮齐鸣。世界各国的劳动者就地静默5分钟，汽车和火车停驶。世界无产阶级怀着悲痛的心情向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列宁告别。

(陈金桂)